

# 人类学和语言学

黄典诚 洪笃仁 周长楫

## 一 语言是使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之得以从动物界划分出来，其重要条件之一是有声语言。这就是说，语言随人类社会的发生而发生，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研究人类学的人不搞点儿语言学是不能成效的，研究语言学的人不学习人类学毕竟也还是如有所缺的。只有双方互相切磋，互相补足，才能两全其美。

当人类还在古猿的时代，虽然会直立起来走路，前肢已会扳缘、搔弄，但由于还没有有声语言，此古猿与彼古猿，心与心之间的意念，还无法沟通，还不能化个体为集体，还不能组织社会，统一意志，进行分工，号召合作，因此，它们始终还是动物界里的一种动物，远不能称为人类。

只有到了古猿通过长期劳动，手、足完全分工，又由于长期直立劳动，大脑发达了，发音器官改进了，使原先可以发出的不多几个单纯元音，已能利用唇舌的控制。例如，我们不妨设想，由原先已能发出的一个一个简单的 a，进化到改为 pa、ma、ta、na、ka、nga……等，而这 pa、ma、ta、na、ka、nga 等又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得以和客观某些事物紧密联系起来。结果古猿甲发了 ma ma 的声母，古猿乙一听就知道叫的是自己。这

样，古猿开始可以用辅音十元音的简单音节进行思想交流了。古猿既获得了有声语言这一有力的工具的帮助，慢慢地，统一了全群的意志，进行了彼此的分工，统一了各猿的行动，不论对于异群的侵害或天然的打击，它们逐渐能以整群的力量去对付。这样，古猿终于从动物界划分出来了，古猿已经成为猿人并进而成为人类了。

劳动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sup>①</sup>。这就是说，人类和语言不可分离，是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恩格斯在论人类对语言的迫切需要时指出：“动物之间，甚至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是很少的。这些东西它们不用发音清晰的语言也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sup>②</sup>。显而易见，人类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原始群，就必须互相传达与交流思想，这种传达交流，哪怕是最简单的，也必须借助语言这个工具。应该指出，正是语言，促进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关于这点，恩格斯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语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类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和脑髓的进一步发达相伴行，它的最亲密的工具——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达起来了。和语言的逐渐发展同时发生的必然是听觉的相应的完善化。同样，和脑髓的发达同时发生的无论如何就是所有感官的完善化。……脑髓和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明白的意识以及抽象力和推断力的发达，对劳动和语言又起着反作用。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以一个常新的推动力”<sup>③</sup>。由此可见，正是语言，推动了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斗争，改善着人们的器官，促进人们智力的发展。当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进步和人类自身智力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语言的发展。整个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人类文明史的大量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点。必须再次指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人类自身的发展之所以变化如此之快，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所以如此之丰富、发达，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关键之一在于人类有语言。

人类学研究人类及其社会文化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可以涉及到人类生物学、人类起源学、心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等各个方面，也需要涉及与人类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由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文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语言学。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二千五百多种语言<sup>④</sup>。我们不知道人类最古的原始群有多少，当然也不知道那时的语言有多少。但是有理由推想，最古的原始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必然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后代语言如此繁多复杂，语言的种类也一定没有这么多。十九世纪历史比较法的出现，使语言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比较法根据对世界各语言的分析比较，提出了按“亲属”关系划分的层次类型，这便是语系——语族——语支——语言这种谱系关系。

我们拿其中一个语系——汉藏语系来作为例子。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包括了西至印度东部地区，中经西藏高原，亚洲大陆南部，一直延伸到中国东部太平洋海岸诸岛屿这一大片地区，汉藏语系分为四个语族：汉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泰语族分僮傣、侗水、黎语三个语支，包括数十种语言，苗瑶语族分为苗、瑶两个语支，包括十数种语言。

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分析，汉藏语系里的诸语言是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它们都是来自原始汉藏语的，也就是说，原始汉藏语是今天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母语”，那么，这种“母语”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有待于做更深入的探讨研究。不过有一点是众所公认的，这就是操这个“母语”的原始人群后来分化成许多相对独立并且是彼此极少甚至不来往的人

群。这些人群尽管最初使用的“母语”是一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里个人变异成分的增加，各个独立人群在生活中的需要和各种新事物的不断增加，遂使原来共同使用的“母语”的差异越来越大。起初也许是方言之间的差异，后天竟成为各自不同的语言了。

这种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汉语为例。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汉语起码有三千六百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在这三千多年中，由于汉族社会的多次分化，产生了许多方言，今天汉语八大方言的差异，汉语诸方言保留着汉语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语言层次的史料，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作为汉语诸方言共同来源的“母语”——古代汉语和汉语诸方言的关系及其演变分化的规律。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社会的分化继续下去，在一定的条件下，汉语诸方言也有可能变成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正象上面所说的泰语族、藏缅语族或苗瑶语族里的诸语言一样。

至于种族（或者是民族）的分化、融合同语言的分化、融合的关系，萨丕尔曾经作如下论述：“种族、语言和文化分布不平衡，……种族比语言容易混合。反过来说，语言会传播到远离老家的地方，侵入别的种族、别的文化领域，一种语言可以在本地灭绝了，反而生存在粗暴地敌视原来说过这语言的人的群体里，并且，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重划文化区域的疆界，而不一定磨灭存在的语言分歧”<sup>⑥</sup>。

由此可见，不管人类学家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文化及其诸方面的研究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不管语言学对人类语言的语系结构做了多少的分析研究工作；必须肯定的是，如果人类学的研究同语言学的研究不密切配合，那么无论哪方面的研究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

人类社会的今天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人类还将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与高度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人类精神文明财

富的媒介——语言，应是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人类学工作者必须同语言学工作者进一步携起手来，密切配合，互相协作，使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二 人类的亲属关系和语言的亲属关系

人类有死亡，也有繁殖，尽管自然灾害、社会斗争会导致人们的死亡，但人类到底在创造文明、提高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孳生繁殖。一群人同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生活，生于斯、作于斯、息于斯、死于斯。但是久而久之，生齿日繁，原住地区，或者由于生活资料供应不了了，生活场所容纳不了了，或者由于自然条件例如气候的变化，或者由于互相残杀之类的社会原因，于是原始群遂不断地发生分化，不断地有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发展，远走高飞去另建家园了。当然这种情况不限于发生在原始社会。

一小群人从一大群人里面分裂出来到另外一个新地区定居，又经历了一个相当久长的时间，很自然的，几百年前甚或几千年前从老家带出来的语言，不论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会起一些变化，而遗留在原地的语言，也在那儿日积月累地演变。双方虽然都变，往往速度不同，结果，若有一天彼此的子孙互相碰头，而彼此的口音已经不能进行交际了。

但是从历史根源来说，这两群人本有血缘关系，也就是亲属关系，而双方所操说的语言，也当然是亲属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亲属和语言的亲属一点也不矛盾，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南洋各地的闽南华侨和国内的闽南人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

不过，情况远不会这样的简单。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是没有亲属的两种人，却说了同一的语言。美国的众多黑人也说美国的英语，可做这一类型的实例。在我国，东北满族同胞大都说汉语普通话，福建省内的畲族同胞会说客话方言，也都是明显的例子。

由此可见，人类的亲属关系有时和语言的亲属关系取得一

致，有时互相交差，并不平衡。人类的亲属关系主要系于血缘，而语言的亲属关系更多源于社会。

除了外形显著的殊异如形体、肤色、服饰等，相近的亲属的语言很容易导致说话的双方发生亲属的感情。亲属语言在团结人群、调整关系有特殊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

语言的分化，是随着人群的分化而分化的。人群的分化有种种原因：(1)谋生：在本地不能生活下去或生活不好，只好向外奋斗。闽南地区之华侨特多，原因就在这里。(2)逃荒：本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快到“且人相食”的地步，为着不甘白白饿死，只好往外另找生路。(3)避乱：在外族入侵、中原板荡的当儿，为着不甘作亡国奴，只好整族它迁。今福建人的祖先，有一部分据说就是在西晋永嘉之乱由黄河洛阳一带搬过来的。(4)从戎：因为某地区发生了“反乱”，作为中央最高统治者派兵去镇压，乱平之后，兵士留下，家庭移来，生子及孙，绳绳继。如明正统年间明王朝从南京调来京营大军三万前去福建南平镇压邓茂七的农民起义和唐高宗总章年间派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带五十八姓前去漳州征蛮。(5)驻防：因为某某地区是一个军事据点，封建王朝非派军队去驻防不可。如明初派沐英进驻云南，清初派旗营去驻防福建长乐的洋屿一样。(6)打鱼：因出海打鱼，航程较远，不得不就地设站，搭篷暂居，时间一久，逐渐成为村落、市镇、城邑。闽南人之移居浙南(平阳、玉环)就是这样的。(7)起义：为反抗异族侵略，扁担从军，不幸溃败，就客居异地，如清初闽南人之参与黄道周抗清义举，留居上饶、玉山乡区。又如闽南人参加太平天国义军奋战北上，留居在江苏南部的宜兴乡区。最显著的例子，是清初闽南各地群众随郑成功去向荷兰侵略者夺回祖国的宝岛——台湾。此外，还有其它种种原因，篇幅所限，不能备举。

语言分裂时间越长，双方交际的困难越大，一旦到了不能通话，要辨认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亲属关系，这时，就得运用历史

比较法从三方面去进行严密的考察：①基本词汇的同一性；②语法构造的相似性；③语音相对的规则性。

什么叫基本词汇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认为“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语言的特点本质”。而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又认为：声音的象征跟那被象征的事物的关系，是一种制约的反应作用，完全是杜撰的，其中并没有自然或必然的联系。根据这些道理，两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或方言）的基本词汇，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反之，如出现基本词汇的同一性，便必然是亲属关系的信号。请看下面这个对照的例子：

	农人	植-	箬叶	厝屋子	徛站立	糜粥
厦门	lang <sup>2</sup>	tsit <sup>8</sup>	hioʔ <sup>8</sup>	tshu <sup>5</sup>	khia <sup>6</sup>	be <sup>2</sup>
泉州	lang <sup>2</sup>	tsit <sup>8</sup>	hioʔ <sup>8</sup>	tshu <sup>5</sup>	khia <sup>4</sup>	bɔ <sup>2</sup>
漳州	lang <sup>1</sup>	tsit <sup>8</sup>	hioʔ <sup>8</sup>	tshu <sup>5</sup>	khia <sup>6</sup>	bāi
台湾	lang <sup>2</sup>	tsit <sup>8</sup>	hioʔ <sup>8</sup>	tshu <sup>5</sup>	khia <sup>6</sup>	be <sup>2</sup>
莆田	nang <sup>2</sup>	dɔ <sup>8</sup>	ni̍buʔ <sup>8</sup>	tshou <sup>5</sup>	khyo <sup>6</sup>	
福州	nɒng <sup>2</sup>	suo <sup>8</sup>	nuo <sup>8</sup>	tshuo <sup>5</sup>	khie <sup>2</sup>	

在上表里，厦门、泉州、漳州、台湾的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其关系之亲密也是一望而知的。至于福州、莆田，就不那么整齐（请参考下面语音相对的规律性）。

什么叫语法构造的相似性？这里举人称代词和指代词为例：

第一人称“我” 第二人称“女” 第三人称“伊”

厦门	g ua <sup>3</sup>	li <sup>3</sup>	i <sup>1</sup>
泉州	g ua <sup>3</sup>	lɯ <sup>3</sup>	i <sup>1</sup>
漳州	g ua <sup>3</sup>	li <sup>3</sup>	i <sup>1</sup>
台湾	g ua <sup>3</sup>	li <sup>3</sup>	i <sup>1</sup>
莆田	k ua <sup>3</sup>	ty <sup>3</sup>	i <sup>1</sup>
福州	n g ua i <sup>3</sup>	n y <sup>3</sup>	i <sup>1</sup>

上表反应，如同基本词汇一样，厦门、泉州、漳州，比较整齐，福州、莆田有点参差。其中第三人称“伊”是最为一致的。

又如：

	近指(ts-)	远指(h-)
厦门	tsit <sup>7</sup> iū <sup>6</sup> (这样)	hit <sup>7</sup> iū <sup>6</sup> (那样)
泉州	tsionŋ <sup>3</sup> e <sup>2</sup>	hiɔŋ <sup>3</sup> e <sup>2</sup>
漳州	tsi <sup>3</sup> iū <sup>6</sup>	hi <sup>3</sup> iū <sup>6</sup>
台湾	tsi <sup>3</sup> iū <sup>6</sup>	hi <sup>3</sup> iū <sup>6</sup>
莆田	tsi <sup>3</sup> iɛu <sup>6</sup>	hy <sup>3</sup> iɛu <sup>6</sup>
福州	tsəŋ <sup>3</sup> uaŋ <sup>3</sup>	hyəŋ <sup>5</sup> uaŋ <sup>3</sup>

近指[ts-]、远指[h-]各点相当类似。

什么叫语音相对的规律性？在普通语言里，我们有一条基本的原则说：语音的转变是一律的。从空间上说，这仅限在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关系中。就声母而言，例如：福州、莆田的[n-]到闽南会变为[h-]，这在中古，一定属于“日”母或“疑”母，而且又一定是基本词汇中的核心词：

	肉 亲骨~	燃	箸 叶	艾	岸
福州	ny? <sup>8</sup>	nieŋ <sup>2</sup>	nuo? <sup>8</sup>	ŋiɛ <sup>5</sup>	ŋan <sup>6</sup>
莆田	fsoe? <sup>8</sup>	tsəŋ <sup>2</sup>	niɛu? <sup>8</sup>	ŋyɔ <sup>6</sup>	hua <sup>6</sup>
厦门	hik <sup>8</sup>	hiã <sup>2</sup>	hio? <sup>8</sup>	hiã <sup>6</sup>	huã <sup>6</sup>
泉州	hiak <sup>8</sup>	hiã <sup>2</sup>	hio? <sup>8</sup>	hiã <sup>5</sup>	huã <sup>5</sup>
漳州	hik <sup>8</sup>	hiã <sup>2</sup>	hio? <sup>8</sup>	hiã <sup>6</sup>	huã <sup>6</sup>
台湾	hik <sup>8</sup>	hiã <sup>2</sup>	hio? <sup>8</sup>	hiã <sup>6</sup>	huã <sup>6</sup>

就韵母而言，例如福州的[ɸŋ]，在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台湾是[-aŋ]。这是中古，一定属于通摄一等：

	篷	冬	农 人	工	红
福州	phɸyŋ <sup>2</sup>	tɸyŋ <sup>1</sup>	nɸyŋ <sup>2</sup>	kɸyŋ <sup>1</sup>	ɸyŋ <sup>2</sup>
莆田	phaŋ <sup>2</sup>	taŋ <sup>1</sup>	naŋ <sup>2</sup>	kaŋ <sup>1</sup>	aŋ <sup>2</sup>
泉州	phaŋ <sup>2</sup>	taŋ <sup>1</sup>	laŋ <sup>2</sup>	kaŋ <sup>1</sup>	aŋ <sup>2</sup>
厦门	phaŋ <sup>2</sup>	taŋ <sup>1</sup>	laŋ <sup>2</sup>	kaŋ <sup>1</sup>	aŋ <sup>2</sup>
漳州	phaŋ <sup>2</sup>	taŋ <sup>1</sup>	laŋ <sup>2</sup>	kaŋ <sup>1</sup>	aŋ <sup>2</sup>

台湾 phan<sup>2</sup> tan<sup>1</sup> lan<sup>2</sup> kan<sup>1</sup> an<sup>2</sup>

有了这三方面根据，我们就可以把两种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建立起来了。关系越亲，上述三方面的共同点越多，关系越疏，上述三方面的共同点越少。我们可以比较共同点的多与少，来划分两种语言或方言的层次、亲属关系。

两类人群所说的两种语言或方言在地理上不一定互相接壤。有时候地域上离得很远，而两种语言或方言却是非常亲近的。例如江苏宜兴乡区的闽南话虽与宜兴城关及四郊的吴语结为比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疏远的。反之，它与闽南相隔千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属至亲。

### 三 语言材料可以填补人类历史记载的空白

人类靠有声语言的帮助，终于从动物界划分出来了。但是又要经过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人类才创造书写语言的文字。人类有了文字之后，由少数掌握文字工具的人去记载本族的历史。最初这种记载，都偏向于简单。奴隶制国家和封建王朝设立了史官，史官写了史书，以我国的情况而言，都不免于偏写帝王将相，把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的丰功伟绩，倒反搁在一边了。这是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

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光辉业绩既然往往被史官搁置在一边，但是他们毕竟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之所以为后人所景仰，靠的就是被埋在地底下的文化遗物和人们口头或保留在载籍里的文字。人类在与自然展开的斗争中，经常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既有发明和创造，便必须用口头的有声语词表达它，这些语词有的口碑相传一直保存到今天的某某方言里，有的仅见于个别的文字记载。

人类的一群在建立了国家，创造了文字之后，由于斗争或各种原因，甚至有整群被灭亡的史实，然而由于它有文字记载，被

世人所知。因此，其人虽亡，其文化历史还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还不免有人下工夫去研究。这情形发生在古西域一带的吐火罗。

但是也有恰和上述情况相反的史实，一个异军突起的部族，恃其所向无前的战斗力，竟以铁马金戈征服了文化高过自己数倍的大族。在其既得统治权之后，深感“马上得天下易，马上治天下难”，乃不得不降心下气，努力学习被征服的大族的文化以便于更好的巩固自己对于别人的统治。这样久而久之，统治者让被统治者同化了，统治者自己的语言消亡了，日常操使的反而是被统治者精美的语言。清统治者君临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其结果就是这样的。

语言的顽固保守性必然要导致语言的坚强抗拒同化的抵抗性。近代资本主义殖民者，在殖民地曾经想方设法要同化殖民地人民的语言，结果，他们真是枉费心机：殖民主义者被驱逐出去了，殖民地人民的语言被完整保留下来了，清末甲午中日之战以后的五十年，我国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坚持民族语言（方言）正是这样的。

两类人长期的互相接触，不可能产生第三种的新语言。但是在词汇方面，往往会交互渗透，出现甲方有向乙方的大量借词，或乙方有甲方的若干借词。东方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语言中各有不同分量的汉语借词，但是她们各自的语言性质不变。借词是人民交往、文化交流的结果，借词不可能淆乱语言的疆界。

历史书上缺书的重大事件，往往借语言词汇的反映而得到原委的真相。例如中原人民怎样移居到福建，史志每多语焉而不详。《福建通志》引《三山志》：“永嘉之乱，衣冠如闽者八族”。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从闽语方言的若干基本词汇里，却看到当时移居的“险阻艰难，备尝之矣”的一些情况：

管人叫“农”，说明，不远千里而来，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人们必须把农业生产搞好。

管田叫层，说明，福建多山，移居之初，自北而南，自东徂西。多山必须开辟为梯田，梯田层层为级，故名曰“层”。

管屋叫“厝”。厝者措也。厝为临时的安置，并非俨然的屋舍。由此词看出初来生活之不定。今地名往往有某姓之后接以厝者，如何厝、黄厝、叶厝、曾厝等等，又皆整族迁移，同甘共苦。不知更历几多尝试，然后定居。

闽地人民多籍中原地区，言谈之间，多存古语。如谓你曰女，谓他为伊，谓走曰行，谓眼曰目，谓脸为面，谓口为喙，谓足为骭，谓柴为樵，谓乾为凋，谓打为拍，谓衣为衫，谓事为治，谓杀为夷，谓土为塗，谓香为芳，谓吃为食，谓从为缀，谓冷为寒，谓怕为惊，谓男人为丈夫，谓赞美为婀娜，谓瞎目为青盲，谓婆婆为大家，谓儿媳为新妇，谓干净为清气等等，真是举不胜举，俯拾皆是。

人类有理想、有创造。人类最高的创造是建设“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共产主义世界”。人类的语言将是种类越来越少，差距越来越小。现在千差万别的语言，可以预料，将来一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趋于一轨。如何设想将来会有融合万国的语言而出现的一种大家乐于接纳的世界通语？可以有两种设想。一是设想以人造的“世界语”做共产主义社会的语言，一是设想以流行最广泛的某一个区域性语言，逐渐取得全球性语言的资格。这在目前当然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却是人类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这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望的实现虽然遥远，却不是不能实现的，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进行长期不懈的研究和探索。让我们为人类的未来和语言的未来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吧！

#### 注释：

- 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语言》，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9页。
- ② 同上。
- ③ 同上。第10页。
- ④ 见《半月谈》1980年第12期。
- ⑤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9页。